

怀念沈康身先生

沈康身先生 1923 年 9 月 2 日出生于浙江省嘉兴市濮院镇。少时家贫，先后就读过小学和私塾，1936 年考入省立嘉兴中学（初中）。1937 年嘉兴沦陷，他随全家逃难到乡下，因而初中只读了三个半学期。1938 年 1 月，考入上海的浙光中学（高中）。1941 年，考上之江大学土木工程系，不久，插班进入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1945 年毕业。毕业后相继在沪、皖、浙、苏等地的中学教数学，颠沛流离、生活清贫。1949 年，被母校嘉兴中学聘为理科首席教师（教研组长），一年后兼任教导主任。教学之余，自学俄语，钻研俄文大中学数学教材，焚膏继晷，孜孜不倦。1954 年秋，被调往浙江师范学院（1958 年与新成立的杭州大学合并为杭州大学）数学系任教。三年间，修完数论、数学分析、实变函数、变分法、拓扑学、概率论等课程。

1955 年春，由系主任徐瑞云教授介绍，开始师从钱宝琮先生。同年，钱先生来到上海，为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开设中国数学史课程，为期一月。沈康身随行，并随班听课，正式接受了数学史启蒙教育。从此，先生走上数学史研究之路，当年即在《数学通报》上发表一篇关于中亚数学史的译文。

1960 年代上叶，先生在《数学通报》、《杭州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中算史论文多篇，其中，“梅文鼎在立体几何上的几点创见”一文引起著名数学家、《杭州大学学报》主编陈建功先生（1893~1971）之高度重视，作为首篇发表于该刊第一卷第一期。在教学与研究之余，先生开始自学法语和德语，并收集大量资料，编写《德汉数学词汇》（后于 1983 年出版）。文革十年中，他广泛阅读了中外古建筑方面的图书，留下数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和数千张的插图，他还结识了京、沪、宁等地的许多古建筑专家。1970 年起，为工农兵学院开设测量课，并与学员一起上山下乡，在浙江省各地做大范围的控制网地形测量，风餐露宿、不辞辛劳。1980 年代，他考察了全国各地的著名古建筑，先后在浙江大学建筑系、杭州大学历史系、浙江工学院建筑系开设中外建筑史课程，累计十余届。笔者有幸在本科三年级时听过他的中国建筑史讲座——“巍巍古塔”，平生第一次欣赏到丰富多彩的中国古塔建筑艺术，对于他精心准备的一张张幻灯片，至今记忆犹新。沈先生还为杭州大学外国留学生开设中国建筑课程。

1980 年代是先生学术生涯的高峰期。这个时期，他关注中外数学史的比较研究，著述丰硕，《中算导论》（1986）一书是其中的代表之作（此书于 1990 年获国家优秀科技图书一

等奖)。他在《精密科学史档案》、《国际数学史杂志》等国际刊物上发表的多篇论文促进了西方学者对中算史的深入了解，提升了中算的国际地位。同时，先生又与白尚恕先生、李迪先生、李继闵先生等开展合作，相继出版《〈九章算术〉与刘徽》（1983）、《秦九韶与〈数书九章〉》（1987）、《刘徽研究》（1993）、《中国数学史论文集》（4集，1983-1997）、《中国数学史大系》（10卷，1996-2003）；创办高校教师数学史进修班（北师大，1984；徐州师院，1986）；组织数学史国际研讨会。又先后出席第一、二、三、五届中国科学史国际研讨会。

1991年退休后，先生依然笔耕不辍。除了主编《中国数学史大系》的第二、四、五卷及副卷第一卷外，又集长期研究结果，将《九章算术》及其刘、李注译为现代汉语，并作详细注释，出版《〈九章算术〉导读》（1997）；还将自己历年的有关笔记、研究和学习心得编辑成近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历史数学名题赏析》（2002）。

早在1983年，科学出版社就约请先生撰写《九章算术》英文译释本。将《九章算术》这部典籍译成现代汉语已属不易，而要将译成的现代汉语再译成英文，则更不易。先生在现代汉语翻译的同时，也进行英文翻译，且自己用英文打字机打字。1988年，他携带初稿出席在美国圣地亚哥举行的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会上广泛征求对译稿的意见。1988年开始，先生与墨尔本大学的郭树理（J. N. Gossley）教授、伦华祥（A. W. -C. Lun）博士建立了合作关系。从1992年开始的整整七年间，他携带译稿，先后两度赴澳，与郭、伦反复讨论，锱铢必较，数易其稿，最后于1999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先生生前曾与笔者说起他在澳洲时“牟合方盖”一词的翻译过程。先是，他口讲指划、向郭树理介绍《九章算术》少广章刘徽和祖暅求球体积的全过程，讲了整整一天。郭听得津津有味，深深为牟合方盖这个立体所吸引。在双方的切磋下，对刘徽和李淳风注之数学内涵的英文表述很快达成共识，但“牟合方盖”一词究竟如何翻译，则让他们伤透了脑筋。当年丹麦学者华道安（D. B. Wagner）将其译为“box-lid”（盒子的盖子），显然不合原意。对于用汉语拼音 mouhefanggai 的建议，郭树理耸耸肩说：“W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don't understand.”于是，他们只好暂时搁置这个问题。一个雨天，郭树理带着伞前来办公室讨论译稿，先生忽有所悟，对郭说道：“‘牟合方盖’就是像两把伞上下相合的图形。”斟酌片刻，郭提议将其译为“joined umbrellas”。一个难题就这样圆满解决了，真有点“译文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味道。从这段插曲中我们可以看出，《九章算术》之英译的确是困难重重的。译释本于2001年获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这大概是科学史类著作很少能获得的殊荣。

《历史数学名题赏析》出版后，先生已是八十高龄，但他仍然坚持每天花数小时写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海边拾取美丽的贝壳”。他相继出版《数学的魅力》1—4集（2004-2006

年)，还在《自然科学史研究》、《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魅力》出完四集后，先生又有新的出版计划——《中算揽胜》。然而，严重的骨质疏松症致使他长期卧床，写作进展相当迟缓。其间，师母帮他誊抄了许多文稿。师母告诉笔者，先生曾说该书将是他最好的一部著作。本与北师大出版社约定，于今年元宵节交稿，孰料天不随人愿，2008年11月15日因骨折入住浙江第一医院，从此再也没能回到他深居简出二十余载的体育场路杭大(现为浙大)教工宿舍。

先生一生热爱教师职业，每逢次日有课，当天晚上在写好讲稿之后，总要把要讲的内容是在脑中过一遍。他对学生要求也很严格。记得有一次笔者做《数书九章》读书报告，板书中有一个字的笔顺不对，他立即指明。他还告诉我们当年陈建功先生严格要求研究生做读书报告的故事：一位研究生做读书报告时手里只拿一本书就直接走上讲台，陈先生当即让他回去重新准备，写好讲稿下次再来报告。

曾在杭州生活过、并听过先生中国建筑课的美籍华人何庆华女士在其回国见闻录“红星下的故国”一文中回忆先生当年为美国留学生讲授“中国建筑”短期课程之详情：

“担任‘中国建筑’的沈康身，是唯一直接用英文讲课的教授，他是数学系的教授，以数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建筑，这门课在杭大相当叫座，除了每年为外国学生开短期讲座外，杭大本校学生选修的也不少。我第一次看见沈教授是在专家楼楼下的服务台前，那天下午我从浙江昆剧团回来，正好我们学生也下课回来，楼下乱哄哄的一片。一进门我就看见外子坐在服务台前的藤椅上，对面坐了个头发花白西装整齐的瘦小老头子，两人专心一意的在谈话，好像并未注意到我进来。因为那位老先生谈话中夹了几个英文字，我不禁对他多看了几眼，也就自顾自上楼回房去了。隔了一会儿外子上楼来，我问他刚才楼下那位老先生是什么人？他说就是下周要为我们讲‘中国建筑’的沈康身教授，特别来探问我们学生的程度和背景，好预备下周的讲课。当时我心想这位教授倒是挺认真的，好像很拿我们这几个美国学生当一回事！”

等到下一个星期，我也和大家一起去听‘中国建筑’，才发现这位沈教授原来不用翻译，自己可以直接用英文讲课。他并且预备了一份英文打字油印的大纲发给学生，上课时板书极多，不厌其详的在黑板上画图讲解。不像其他教授，由翻译代念讲稿，自己只坐在一旁，等着学生有问题再通过翻译来回答。他好像并未留过学，英文全靠自修，发音虽然带有江浙口音，讲课和与学生交谈却很流利，一点没有‘沟通’的困难。‘中国建筑’分三次讲完，每次三小时，包括的范围有：建筑在艺术科学上的运用与人类生活的关系、中国建筑的材料和结构、中国建筑的历史演变、最主要的四类中国建筑：（一）

公共建筑，如长城、桥梁和宫殿。（二）私人的房屋和庭院。（三）宗教建筑，如宝塔和寺庙。（四）陵墓建筑。最后他又就中国建筑的构图和层次，作了一个详尽的解说，这一部分实际上最有意思，像中国建筑特有的重檐、四合院、歇山顶、斗拱、正吻和吻兽，都一一介绍给学生。

除了投影片和幻灯片外，沈教授还准备了一套录影带，介绍中国的宝塔。电化教材在美国极为普通，几乎每一个教授都采用，……但在中国，电化教材用具非常宝贵，都是外汇购买的进口货，一校往往只有一两个放映机，平时锁得牢牢的，教授要用得先申请，到时‘外办’差人送到教室，负责开关机器。吃‘大锅饭’的人都怕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沈教授为了我们这几个美国学生，肯不怕被人讨厌地去惹这些麻烦，这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只有我们自己吃粉笔灰的人才能深切体会！

除此之外，他为了增加学生的兴趣，还亲自跑去找校长，要求为我们安排去游一次宁波，因为宁波的保国寺，是中国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建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沈教授自己和二位‘外办’人员陪我们坐火车去，他还嘱咐他那班不能享受公费旅行的国内弟子也各自想办法赶到保国寺。在保国寺的大殿上，他带了这批华洋杂处的学生，中英文并用，不厌其详的介绍屋顶上的斗拱，天花板上的藻井，又及鼓形、覆盆形的柱础。又爬上高坡，去看屋檐上的重檐和吻兽、歇山顶等等。……我生平最怕的是数学，也最不愿看见数学老师，这样一位数学教授，却令我想起国文老师所说的‘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来了！”^①

当时已逾花甲之年的先生竟如此认真地对待教学，实在感人至深。

先生有惊人的记忆力，懂英、法、德、日、俄等多种语言，亦曾花大半年时间学习拉丁文，未果。先生之刻苦与勤奋，常常令作为学生的笔者汗颜不已。他一生从图书馆抄录的笔记不计其数。笔者曾读过他于1964年抄自上海图书馆的《堤积术辩》（作者蒋维钟）；而在浙大西溪校区（原杭州大学）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笔者所能见到的数学史类图书的卡片上，无不登录着先生的名字。

住院之后，先生心里依然放不下那部未完的书稿。气管被切开之后，再也不能说话，只能用手指在师母的手心写字，但已无法辨识。笔者前往探视时，先生已经没有了意识，再也未能睁开双眼，惟有一息尚存。

今天，翻阅那部未完的遗稿，见到一行行熟悉的笔迹，人天相隔，人琴之痛，其何能已！笔者惟有努力去整理这部遗稿，使其早日付梓，实现先生遗愿，则或可让先生含笑于九泉。

^① 何庆华. 红星下的中国(二)——四十年来家国之二. (台)传记文学, 1988, 52 (1): 45-53